

记

日

泽

纪

曾

曾纪泽日记

三册书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记

日

泽

纪

曾

曾纪泽

日记

非 錄 也 也

1880年11月11日

记

目

泽

纪

曾

曾纪泽日记

（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刘志惠 点校辑注
王澧华 审阅

曾
纪
泽

曾 纪 泽 日 记
(上册)

岳 麓 书 社

刘志惠 点校辑注
王澧华 审阅

曾
纪
泽

曾 纪 泽 日 记

(中 册)

岳 麓 书 社

刘志惠 点校辑注
王澧华 审阅

曾
纪
泽

曾 纪 泽 日 记
(下册)

岳 麓 书 社

本书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出版

点校辑注 刘志惠
审 阅 王澧华
责任编辑 管巧灵
封面设计 胡 颖

曾纪泽日记

[清]曾纪泽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9.25

字数:1,540,000 印数:1-3,000

ISBN 7-80520-813-1

K·182 定价:8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编校说明

一、《曾纪泽日记》是对现存曾纪泽全部手写日记(清同治九年正月至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亦即1870—1890年,共计20年)及其生前亲自校订增删之初始刻本的首次汇编。

二、本次整理,以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4月影印出版之《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为底本,以清光绪七年(1881)秋上海申报馆刊印之《申报馆丛书余集》之《曾侯日记》为校补本,并且部分参照了张玄浩辑校之《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喻岳衡点校之《曾纪泽遗集·日记》(岳麓书社1983年7月出版)以及王杰成标点之《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11月出版)。

三、手写稿中,颇有空缺,多为人名、地名,想系仓促间记忆不清而暂作空白,后来亦未补注。本次整理,以“□”标注相应字数,不能确定字数者,使用省略号,且以页末脚注说明。其残损漶漫之处,则以“△”标注。

四、原稿于经史典籍之篇目不甚讲究,本次整理,凡书名用书名号,篇名则用引号。

五、避讳字径改,通假字不改,人名之异体字不改。其夹注、旁注之字,置于“()”之内。原有之错讹衍脱,仍其旧,而于其后加“[]”著明正字。

六、每年起首之年号纪年及每月开头之月份,乃整理者所加,此亦为醒眉目、便阅读起见。

前 言

——还一个全璧，给一个说法

纯粹就版本而言，这将是曾纪泽日记的第九个版本。在此，有必要对前此各种版本目录及其优劣略为论列。

1、《曾侯日记》：见《申报馆丛书余集》，光绪七年秋申报馆仿聚珍版排印，尊闻阁主人编。起光绪四年九月初一日，止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约四万五千字。

2、《出使英法日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三年王锡琪编刊。起讫、字数同上。

3、《曾惠敏公日记》，见《曾惠敏公遗集》，光绪十九年江南制造总局刊印。起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止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约五万字，二卷。

4、《使西日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续编》第十一帙，光绪二十三年王锡琪编刊。起光绪三年秋，止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约五万字。

5、《曾惠敏公手写日记》：见吴相湘主编之《中国史学丛书》第十三辑，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据手稿影印出版。起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止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六日，约一百三十万字，八册。

6、《使西日记》：见钟叔河主编之《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张玄浩辑校。起讫同于小方壶再续编本，七万余字。

7、《曾纪泽遗集·日记》：岳麓书社1983年7月出版，喻岳衡据江南局本点校。

8、《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见钟叔河主编之《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11月出版，王杰成标点。起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止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约五十六万字。

上述各本，无一首尾完具，各有利弊得失。

相对而言，台湾影印本是最完整、最权威的善本。但是，它仅在三十二年前印行一千册，大陆藏本极少，读者难以寻求，且系繁体草书，又无标点，不便通读，尤其重要的是，它缺失了相当一部分有关外交事务的内容。

节取台湾影印本的王杰成标点本，采用新式标点，旁注要义，末附索引、译名对照，且藉《走向世界丛书》之力，流行甚广。而且在数量篇幅上，它超过张玄浩本十倍，内容充实详明，致使多数读者废彼从此。但是，张玄浩本比影印手写本多出的将近二万字外事记录，也随之被多数人忽略了。并且，作为对曾纪泽日记最近一次最大规模的整理，它仍是个节录本（摈弃整理十一年又三个月日记，约七十五万字），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张玄浩本前有《丛书》主编钟叔河先生先后所撰序言，据称钟先生在80年代初期，将能找到的三个版本（小方壶初编、再编与江南局本）交北京图书馆张玄浩同志点校。这在当时，确实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究其原因，小方壶初编本有曾纪泽本人认可的多出他本的内容，江南局本又比初编本多出了光绪五年至十二年的日记，而再编本又改正了江南局本的一些错讹字句。张氏各取其长，汇辑成书，成为一个最早的标点本，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但仅隔四年，王杰成本出，张玄浩本即被基本取代。

江南局本想系曾纪泽之亲朋故旧所编，经查证，其底本乃兼用手写原稿与申报馆本。

小方壶初编、再编本皆未言所据何本，经查读，再编本取诸江南局本，而初编本则系翻刻申报馆本。

光绪七年秋面世的申报馆本《曾侯日记》是曾纪泽日记的首次印行,数月之后,曾纪泽在法国首都巴黎看到了它。光绪八年正月二十日,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看上海所印余之日记。”九月二十一日,他又将之从巴黎寄赠浙江巡抚陈士杰,并致一函,谓“初出洋时,写日记寄译署,不知沪人何由得稿,公然刷印,奉一册以供一笑。”经查实,曾纪泽所称“沪人”,其实并非“沪”人,乃是以笔名“尊闻阁主人”闻名中国近代报业的申报馆业主、英国商人美查。美查主持《申报》期间,多次登报征购汉籍珍本,且利用外籍商人身份,向中国官绅多方访求手稿、抄本,交付下属企业申昌书局印行。检其《曾侯日记序》曰:“昨于友人案头,见有侯手录日记一本……因取此卷,排印成书。”这个“友人”想来也非寻常人物。美查确实具有很高的新闻职业敏感,当曾纪泽奉命出使英、法,出京至沪,行将去国远航时,美查即亲往曾纪泽客寓,专程拜访。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申报馆米查来一谈。”米查即是美查。

申报馆仿聚珍版丛书印数甚少,又系木质活字,且无纸型,迄未再版,现在已很难访求。依照惯例,每一种书印出,报馆只向手稿或孤本之原主赠送样书数十册。故曾纪泽远隔重洋尚有馀本送人,而与上海比邻的浙江巡抚却似并不知情。曾纪泽在陈士杰请教洋务经验时寄赠此书,可见他对这本日记是很重视的。

前此各本的整理者,对最早问世的申报馆《曾侯日记》皆未言及。惟张玄浩本之《序言》,则据曾纪泽致陈士杰信,猜测小方壶初编本的“母本可能就是沪人‘公然刷印’的本子”,然后推论:“曾氏将其寄赠友人,说明它比全集本(笔者注:即江南局本)多出的部分是可靠的。”

在没有反证之前,这个推论似乎可以信从。但是,取台湾手写影印本两相对读,则上述“多出的部分”竟然并未见诸手稿。那么,

它还能说“是可靠的”吗？人们似乎没有理会这一问题。

经过反复深入的研究，我发现，“多出的部分”乃是曾纪泽对手稿的再创作，的确“是可靠的”

1、出使他国者，例当缴送日记。

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请，各出使外国大臣对有关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皆当详明纪载，随事咨报。故郭嵩焘、刘锡鸿人在国外，而郭之《使西纪程》、刘之《英轺私记》皆已寄呈总署，刊行于世。朝廷既有明文要求，前任又有刊本传播，故曾纪泽奉到出使谕旨，便作好了抄录日记、预为刊刻的准备。

2、使署从官缮录副本，曾纪泽自为核改，有增有删。

抵任后，每隔一段时间，曾纪泽便命文案曹咏愈（字逸斋）等从官“钞”“缮”日记，复自“校阅”、“删削”、“改正”（皆《手写日记》中语）这一缮本。后来，他又事先“择日记应钞者圈识之”而付抄手。大概是从官代为缮录，不敢擅自节略，及至缮出，曾纪泽再为删削琐事，已觉耗费人力，故尔事先圈划节取。圈识之后，他还有多处批注，嘱咐抄者或将后段“改录于前”，或将另纸写记者连贯抄录。

在日记原稿之外，曾纪泽命从官持续缮录副本，并且亲自核校，删削寻常琐事，增补重要内容，同时改正误字，想来必是寄呈译署，以备审查刊刻之用，事实上，他在巴黎致陈士杰的信中已经明言“写日记寄译署”，又称“沪人”“得稿”，“公然刷印”，可见申报馆《曾侯日记》的底本，便是从官缮录、曾纪泽核定的日记副本。而他在《手写日记》原稿上的圈划节取、批注指示，确与《曾侯日记》若合符节。如光绪五年二月初四日《手写日记》天头批曰：“‘来见’之下，添后一段，自‘马尔特尔’至‘幸甚矣’。”下段马尔特尔一节天头，复自批曰：“自‘马尔特尔’至‘幸甚矣’改录于前。”此段系曾纪泽与法国上议院首领马尔特尔之对答，《曾侯日记》正是按照这种安排而“改录于前”的。

曾纪泽对自己所作日记在誊录过程中进行增补、删削等方面的再创作,早有先例。台湾学生书局 1965 年影印之《湘乡曾氏文献》第十册便夹杂了他的十页日记手稿残片,起于十三日,迄于二十二日。考其内容,知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间事。初以为《手写日记》缺此十日,及至开卷检视,又并无短缺,两相对读,则发现互有异同。据初步判断,这十页单张散片,乃曾纪泽自省下乡,日记簿未随身携带,因拾取散页、随日记注,回省乃誊于日记簿中。誊录之时,复自修改。这才造成了那十日日记的重复与歧异。这一事实的发现,为“曾纪泽在校校从官缮录之副本上再为增删”的判断,提供了新的证据。

曾纪泽对《手写日记》的增补,一则描述西洋风俗物产、科技文化与地理形势,这是服从于总署对使臣的要求的;二则半为表白、半为评论,这又是符合当事人事后发挥的心理的。这些重要内容,皆未载诸《手写日记》,这便是《曾侯日记》的价值所在。惜《曾侯日记》仅止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其后曾纪泽所作增补之若干内容,如书于《手写日记》光绪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间的七处“下接另纸”,即迄未发现。

这次整理出版的《曾纪泽日记》,便是以《手写日记》、《曾侯日记》两个最权威的本子为底本,重新汇辑编校,使之成为一个较为完善的定本。

1、较之于《使西日记》、《出使英法日记》以及《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曾侯日记》更为权威可信,更为独特珍贵。因为它是经过曾纪泽亲自校核增补而汇编成书的第一个版本,出版之后,又迅速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认可,而那些增补手稿现已散佚、难于寻觅了。兹略举数例:

光绪四年九月初三日之增补曰:

两相国(笔者注:指武英殿大学士宝璽、协办大学士沈桂芬)枉临,皆以道路之遥、风涛之险为念,谈次慰藉良厚。余思道路虽遥而火轮车日行千里,以视仕于云、贵、甘肃者,远近不同而劳苦适相等耳;风涛虽险,而人生吉凶自有运命,无可趋避。奉旨以来,于此二者尚不甚措意。所惧者,事任艰巨,非菲材之所堪称。先人名望,海外闻知,偶有失误,则上累前徽。郭筠仙丈在欧洲,其得西人敬重,承乏其后,深恐相形见绌。夙夜兢兢,实在于此。友朋或言西人咸知先太傅威德,纪泽奉使,事必顺手,又言郭筠翁创建规模,此去萧规曹随,无所事事者,皆举其一面以相宽譬,未曾思及对面也。

这是表白不避艰险、为国尽职的忠臣心态。

同年九月十七日之增补曰:

伯行(笔者注:指李鸿章子李经方,光绪中亦随使德国)聪慧绝人,从朱静山暨白狄克学英文英语,甫期年已能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西文条例虽极繁密,然于空灵处,轻重分寸不甚入细,故较华文为易。子弟口齿明亮者,塾课之暇,日令兼肄西文,三五年便可通晓,亦有益之学也。伯行志意专笃,手操铅笔,口诵《话规》,孜孜不倦。初时甚自隐秘,惟余与吴挚甫知之,近日李相始有所闻。余劝相国因延师而教之,以成其志。昔年吴子登太史口不能作西音,列西字而以华音译读,是为奇法,其记悟亦属异禀,非人人所能学也。余能西音,然在湘苦无师友,取英人字典钻研逾年,事倍功半,又年齿渐长,自憾难记而健忘,一知半解,无可进矣。深愿友朋年富而有志者,相与勉焉。

这是直截了当的人物表扬。

同年十月初五日之增补曰:

商农(笔者注:指汤书霖,长沙举人,同治末年在省参与编

刊《曾文正公全集》，后任新化教谕。曾纪泽使俄，特为奏调驻俄三等参赞）与余至好，但不甚以洋务为然，尝规余与松生（笔者注：曾纪泽妹婿陈远济，此番随行，任驻英二等参赞）不应讲求西学。每聚首论议或音问往来，方枘[杓]圆凿不相入也，然终不失为端人，亦不失为益友。来函谆谆恳恳以清议为言，余答之云：“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兢兢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媚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廊庙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

这是理直气壮的洋务鼓吹，虽说不免有自我表曝之意味。

同月二十七日之大段追记，更是非同寻常：

英领事达文波者，客夏在陈宝渠处同席，纵谈甚欢，作英文诗句以相酬唱，情甚殷也。此次来沪，先遣参赞往拜，俟其答拜而谒公使，公使乃复往拜，盖公法通例如此。不意达领事不愿先来，问参赞：“曾公使当以何日来拜？”翻译官以定例答之。达领事怫然曰：“中国不有行客拜坐客之礼乎？”翻译又答：“于平行之礼有之。”领事不答。次日遽一函来，云：“承遣贵参赞来拜，本领事当于某日遣副领事官某答拜。”余答函云：“承约遣副领事官某答拜，本爵大臣当嘱参赞官在寓拱候。”盖

彼以侮慢之意来,而我以游戏之词复之。至日果遣副领事司格达来,指名欲谒公使。余时方卧病,命阁者语之云:“君欲答参赞之拜,则陈参赞拱候已久,前函之所约也。如忽欲见公使,则公使方卧病未兴,不克接待。”司格达乃见参赞而去。达文波囑各国领事不可先来谒见,法领事不从。各国领事曰:“法国最讲仪节,必无失礼,李梅既去,吾辈不可为达文波所误。”遂相继而至。达领事闻而大惭,乃托故游历镇江,始终未一晤谈。方施本思、禧在明之来谒也,余旋至英领事公署,专拜施、禧二人,语之曰:“吾与达领事旧相识也,若以友朋之谊相与往还,则吾先拜达君,本无不可。今达君既责礼于我矣,则领事先谒公使,乃《万国公法》之通例,吾不敢违例而先拜达君。”施、禧二人唯唯,但不敢斥言达领事之非礼耳。美领事贝礼、牛庄美领事鼎德、法领事李梅,则对余讥笑达领事,谓其妄自尊大,且谓渠曾奉朝命赴云南查办马嘉理一案,遂乃以公使自命,其欲居吾曹之上也久矣,盖其平日意见亦不相合也。

追述往事,绘声绘色,指斥英领事之妄自尊大与浅薄无识,同时也表露了自己的民族气节与外交艺术。

十二月十七日之增补亦甚有意味:

日意格欲充中国驻法总领事官,曾求之筠仙丈(笔者注:指曾纪泽前任郭嵩焘,号筠仙),筠翁正色拒之。本日复问于余,余应曰:“此事非使者所能建议。若总署果派足下充总领事,则使者之责任轻松多矣。”余面软,不能效筠翁直言拒之也。

郭嵩焘生性耿直,故对此非分之求,径以直言正色拒之,而曾纪泽则为人机灵,以一种几乎是职业外交家的口吻回敬了对方。两相对照,前者确实是大清帝国钦命出使大臣的架式,而后者则更符合近代外交使节的身分。

他如“润饰而录存”“英才”马建忠之《上李相书》(光绪四年九月初八日),全文转载张焕伦之时务条陈,且称其“卓然有识”、“与余平昔持论大致相符”(光绪四年十月十一日),摘要记述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美国驻上海领事官贝礼、清廷驻日使臣何如璋、驻新加坡领事官胡璇泽、驻法使署翻译法兰亭诸人之面谈或函商之重要内容以及沿途之见闻观感,这一切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2、较之于《曾侯日记》、《使西日记》、《出使英法日记》乃至《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新编《曾纪泽日记》将全面展示主人公同治九年至光绪十六年共二十年间的的生活历程:

随侍直隶、京师与金陵的读书、交游以及受读、庭训经历;

代父批阅文件、草拟信札、应酬官场以及管理署中庶务;

料理其父丧事、整理其父遗集、督率编校刊印的详细过程;

湘中绅士的日常生活与浸润西方文明的种种表现:学英文、诵英话、使用洋器、交结洋友、钻研洋科技、阅读洋小说;

记录诗、文、联语创作;

记载耳闻目睹的京师政局、朝廷政事、两宫起伏、六卿臧否以及光绪亲政后究心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直观感受;

记述任职总理衙门、海军衙门、户、刑、吏部与同文馆、钱法堂之经历及其作为。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至于出使期间一切表现,钟叔河先生在为《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撰写的序论中,早有精辟的论述,故不赘言